

延安时期党如何培养理论人才队伍

□王健范为

延安时期，党从自身建设发展历程特别是历次严酷的内外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加强理论建设，建强一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理论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并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措施，为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顶层设计，为培养党的理论人才队伍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毛泽东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延安时期，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对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2月，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后并入中央宣传部）以领导全党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以领导中央直属院校和党政军民机关的教育工作。1941年9月，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为全体中央委员；随后，各地（系统）相应成立高级学习组，如1941年10月，先后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和以刘少奇为组长的华中局高级学习组，1941年11月，在中央学习组下专设以朱德为组长的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1942年6月，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随后，党中央在各级党委和各抗日根据地成立学习委员会，构建了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理论学习指导体系，开创了以上率下、层层负责的理论学习局面。

当时建立了组织领导制度、分类编组制度、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等，对学习内容和测评作出十分细致的规定，并根据学习开展情况和客观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此外，党中央还专门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发出指示，要求根据当地战争或秘密工作的环境等特殊实际，采取灵活机动的学习方式，确保学习效果。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落实中央

指示，在克服残酷战争环境、做好繁重自身建设工作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组织开展和完成教育工作。

狠抓理论学习，推进理论创新，为提高理论人才队伍战斗力夯实根基。在长期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39年、1940年之交，继《〈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1941年，中央研究组下发文件，要求中央和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党史与革命文献。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下大力气研究阐释，产生了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实行对日抗战》等一批理论成果，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张如心、邓拓等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以笔为刀，坚决反击、有力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文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污蔑，打破了国民党愚民论调的横行，廓清了中间势力对党的曲解，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势力的支持。整风运动更是全面、系统、深入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深刻剖析、批判党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党员干部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极大提高。

重视院校建设，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和教学环节，有针对性提高斗争能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在战时教育体制基础上，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中央党校、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等一批院校，为专业化、规范化培养大批党的理论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师资配备上，从国统区调集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任专职教员，如艾思奇、何干之、李培之等。核心课程和政策教育主要由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理论专家讲授。在课程教学上，以培养政治干部为主的陕北公学为例，普通班4门主干课程中3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和培养斗争能力密切相关，高级班专门加开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教学内容包括适应抗战形势发展，将全面抗战、保卫武汉、论持久战、六届六中全会等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定期组织民众运动演习、统一战线演习，在国民党顽固派加剧本共摩擦时期，组织学员直接赴国统区突击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穿国民党顽固派险恶用心，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勇于投入到严峻斗争中去经风雨、壮筋骨。

注重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锻炼中提升斗争本领。对于培养理论人才尽快成长，毛泽东指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心决议强调，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1941年颁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毛泽东任主任的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工委相应成立机构，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为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锻炼能力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张闻天、蔡畅、林伯渠等先后组织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农村和陕甘宁边区等地调研，形成总结论著《出发归来记》《调查日记》等，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中央还将胡乔木、王学文、成仿吾等一批理论工作者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上，不断在斗争中学习斗争，为以后发挥更大作用历练本领能力。

第三次反“围剿”遭遇战大捷

——老营盘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何兵兵 黄军红

第三次反“围剿”的关键一战

1931年7月，国民党不甘于第一次、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在先消灭红军主力、摧毁我中央根据地后再进行深入“清剿”。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及自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敌后方的战术，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泰和一带，先后在兴国莲塘、永丰良村、宁都黄陂发动进攻，并三战三捷。此时，两广军阀向湖南衡阳进兵，蒋介石急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敌第四军团总指挥蒋鼎文亲带第九师从兴国高兴圩、老营盘向泰和、吉安方向逃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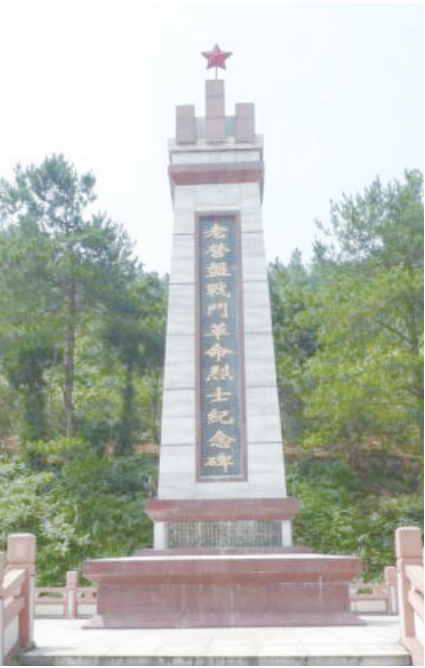
9月6日下午，敌先头部队第九独立旅进到黄土坳、老营盘地区，正值山洪暴发，敌军受阻驻扎在七斗、库头、营盘上、白洋一线宿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获悉此消息，当即决定在泰和老营盘地区首歼后退敌军，并部署红三军3个师和独立第五师抢占老营盘，截断国民党军退路，其他各军分别钳制附近敌人。9月7日凌晨，红三军从茶园岗，经罗坑、成光垌登上驻敌西南之高明山、麻坑岭等制高点，拂晓于浓雾中向敌展开攻击。军部率第九师、独立第五师扼守高明山，正面阻击；第七师从牛軋岭打左翼；第八师从野猪塘打右翼。战斗持续4个小时，全歼敌第九师一个旅。红军乘势扩大战果，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老营盘战斗取得了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第四仗的大捷，重創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这场战斗的胜利，有力证明了毛泽东“诱

敌深入”方针的正确性。同时，也使革命之火顺势得到燎原，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对全党认识和确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勇猛主动、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这场战斗的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黄公略等红军指挥员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思想，即坚持战略上积极防御与战役战斗上主动进攻的统一。然而，老营盘成为战场却具有一定偶然性。1931年9月7日，红军计划在兴国高兴圩围歼国民党蒋鼎文第九师。由于情报出错，红军未能准确掌握蒋鼎文已于6日将高兴圩给了国民党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驻防，准备经老营盘撤往泰和县。7日凌晨，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率部赶到老营盘附近时，意外发现敌蒋鼎文师正在老营盘村的峡谷里集合，准备开拔前往泰和。6日，蒋鼎文师行军至老营盘村时，由于山洪暴发冲走了山溪间必经的小桥，蒋鼎文师无奈停留在老营盘村、黄土坳一带宿营。作为国民党军主力师，第九师共有近一万人马。黄公略的红三军在经过连续大半年的反“围剿”作战后只剩下3000余人。面对如此紧急突发情况，黄公略率领红三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在萧克的独立第五师配合下，以寡敌众向老营盘附近的敌军发起进攻，耗时4小时终获胜利，堪称我军勇猛主动、以少胜多遭遇战的经典战例。由于进攻突然，敌



人猝不及防，俘虏敌军3000多人，毙伤敌军4000多人，缴械3000余件。红军伤443人，阵亡135人，失去联络133人。

这场战斗还得益于红军充分占据了老营盘隘口的有利地理条件。老营盘隘口呈峡谷状，只有一米多宽，两侧都是高地。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深处峡谷之中，一旦突然遭到两侧高地的袭击，只能被动挨打，犹如把敌人装进峡谷“口袋”。正是凭借有利地形优势，敢打敢拼的黄公略积极果断地发动了对敌攻击，速战速决取得了这场遭遇战的胜利。1937年，陈毅路过老营盘时重访了当年的战场，感慨万千，欣然题诗：“大战当年血海翻，今朝独上老营盘。荒台废址无人识，一抚伤痕一泫然”，使老营盘地名再次扬名苏区、光照全国革命根据地。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党的干部教育早期开拓者罗亦农

□陈安杰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接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8页

上海市龙华路2591号，坐落着一处中西样式的建筑，这里是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也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94年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从这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牺牲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训练自己成为忠实、实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

罗亦农，原名罗善扬，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19年夏，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求学。通过《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周刊等进步刊物，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并认识了被誉为“思想界明星”的陈独秀。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罗亦农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首批团员，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1年春，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罗亦农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远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简称东方大学），校内

专设“中国班”，罗亦农是编入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支部，由东方大学总支部领导。1921年冬，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罗亦农组织能力出众，在同学中威信高，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并介绍刘少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在中共旅莫斯科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旅俄的目的：“为的是来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及训练自己成为忠实、实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

1921年7月，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东方大学的学生受邀轮流列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次等重要会议。次年1月，罗亦农与瞿秋白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党的干部教育的早期开拓者

大革命风起云涌，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共中央急需大批信念坚定、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回国开展革命工作。罗亦农于1925年3月回国，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后，奉命留在广州，担任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教育培训干部日益紧迫。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首次提出设立党校教育培养人才。党的四大再次强调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中共北方区委兼地委向中央提出成立一所党校，并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负责。1925年10月，中央批准中共北方区委创办党校，

派罗亦农主持党校工作。

罗亦农与李达、赵世炎等人共同拟定了北方区委党校课程和教学计划，他亲自讲授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党校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位于北京新街口蒋养房胡同的这所四合院内，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为避免反动军警发现，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罗亦农急切地希望能把在苏俄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青年学员。

同年12月，北方区委党校第一期60多名学员正式结业，回到各地开展革命工作。由于罗亦农被中央调到上海，加之党校存在暴露的危险，就停止了办学。尽管北方区委党校培训班只举办了一期，但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干部，对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1926年初，罗亦农出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为打破革命处于低潮的江浙地区的局面，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罗亦农到上海工作后，曾在区委机关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夏，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央江浙区委决定，罗亦农兼任上海军事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再次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起义的胜利，充分彰显了党的强大组织力

